

[文章编号]1004—5856(2004)11—0095—05

# 《三国演义》的妇女观与儒家文化

王菊艳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系,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三国演义》的妇女观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婚姻多属政治交易的手段,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同时,女性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体现为自我意识的缺失与话语权势的失语,导致英雄豪杰的形象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失真。而这一切均与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联。

[关键词]《三国演义》;小说;女性;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主要描写对象是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小说展示了在风云变换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人生追求,从全书的描写来看,其思想内容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罗贯中在人物的价值取向上遵循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叙事时也被这种政治伦理型的文化语境所规定。小说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妇女观,留下了明显的儒家文化烙印,这部小说既反映了我国古代妇女贤德坚毅、深明大义等可贵品质,又有明显的思想局限。对此,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简略的分析与评价。

## 一、小说妇女观的积极方面

从历史发展看,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态,“表现在哲学心态和思维方式上,就是重人生,务实用,看重群体关系,强调伦理道德,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就是个人人格力量的最高境

界。”<sup>[1]</sup>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全面地评价儒家文化,它既有封建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也包含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三国演义》塑造与涉及的人物超过一千人,其中妇女形象就有约八十人。她们多出身于上层社会,有皇后、王妃、诰命夫人、郡主小姐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姬妾、宫女,真正属于下层劳动妇女的很少。小说中很多女性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忠君报国善恶分明等可贵品格。具体说来,《三国演义》妇女观值得肯定之处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小说描写了许多贤德刚烈、坚定勇敢的可敬女性。这类女性的代表有甘、糜二夫人,徐庶、王经之母,马邈夫人,也包括貂蝉。她们受到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影响,有群体意识,见识过人,不畏强权,甚至为忠义甘愿自我牺牲。在“刘玄德携民渡江”这一回,曹兵重重围困了刘备一方,小说写赵云在乱军中找到了已受重伤的糜夫人,她却不肯上马:

夫人云:“妾得见将军,阿斗有命矣。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将军

[收稿日期]2004-09-07

[作者简介]王菊艳(1963-),女,黑龙江拜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可护持此子,教他得见父面,妾死无恨。”(第41回)

糜夫人为了保护并非己出的阿斗(甘夫人所生),毅然翻身枯井而死。糜夫人以性命让赵云从曹军中顺利杀出,救出了小主人,小说的赞语是:“拼将一死存刘嗣,勇决还亏女丈夫。”此外,魏国后期,魏主曹髦为司马昭威逼,国家形势每况愈下,尚书王经为之深深忧虑,后因他不从司马昭,在曹髦被杀后:

昭又使人收王经全家下狱。王经正在廷尉厅下,忽见缚其母至。经叩头大哭曰:“不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谁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弃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经全家皆押赴东市。王经母子含笑受刑。满城士庶,无不垂泪。”(第114回)

王经之母能置名节于生命之上,与徐庶之母一样,深明大义,政治眼光与众不同。此外,蜀国一方还有马邈夫人、北地王刘谡的妻子崔夫人,均为巾帼英雄,她们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看重忠孝节义,明辨是非善恶,这无疑冲击了“女子祸水”的传统迂腐之论,思想虽未走出“三从四德”的樊篱,行为却不乏动人的一面。

第二,小说展示了古代女性的才智过人与机敏聪慧。封建社会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三国演义》却有一些才学智慧过人的不凡女性,在政治斗争中如男人般与敌手斗智斗勇,受到赞赏。例如孔明之妻通晓多种知识,堪称饱学奇才,成了辅佐贤相的“贤内助”:

原来武侯之子诸葛瞻,字思远。其母黄氏,即黄承彦之女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在南阳时,闻其贤,求以为室。武侯之学,夫人多所赞助焉。”(第117回)

东吴方面,孙权弟孙翊为丹阳太守,被督将妨览、郡函戴员二人所杀,并被掳掠家资侍妾,妨览看中了美貌的孙翊之妻徐氏。徐氏先是巧于周旋,后与丈夫的心腹旧将设计除奸,并差人报知孙权:

至晦日,徐氏先召孙、傅二人,伏于密室帷幕之中,然后设祭于堂上。祭毕,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浓妆艳裹,言笑自若。妨览闻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请览入府,设席堂中饮酒。饮既醉,徐氏乃邀览入密室。览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孙、傅二将军何在!”二人即从

帷幕中持刀跃出。(第38回)

这位“才节双全”的“东吴女丈夫”,报了夫仇,她的镇定自若与机智过人,使她成为了胜利者。还有“极其刚勇”、“志胜男儿”的孙夫人,智勇双全的孟获之妻祝融夫人,都令人难忘。小说“张扬妇女也应与男儿一样,大智大勇,临死不屈,舍生取义,为国捐躯,不仅符合《演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也体现了妇女在政治大节和人格精神上与男子的平等思想,是对‘三从四德’的一种伟大超越。”<sup>[2]</sup>

第三,小说反映了动乱年代女性悲惨的命运,不禁令人同情与慨叹。三国时期,诸侯纷争,战乱四起,生灵涂炭,即使是上层贵族女性也有性命之忧,如曹操杀董妃、伏皇后等的描写,表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在动乱年代命如草芥的痛苦遭遇,很多人成为了政治权力争斗的牺牲品,使我们看到了女性命运不能自主的悲哀。

## 二、儒家文化的渗透与小说妇女观的局限性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一样,是明清小说中妇女观存在明显缺陷的一部小说,这与封建制度与文化有极大关联,其中,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礼记·郊特性》中说:“男先乎女”,“妇人,从人者也”,这已经有了“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味道,《礼记·昏义》言:“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则规定了女性的日常工作要求,把女人的生活范围局限在家庭之内。《论语·阳货》中写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是历来为人们所不满的一条言论,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归入一类,是说只有女人和小人是最难与他们相处的,太亲近了,他们就会无礼,太疏远了,他们又要怨恨。相对而言,孟子的态度要缓和一些,他认为君王好色与实行王道并不矛盾,但孟子在《滕文公下》中写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也认为女性应依附男性而生存。在儒家文化看来,女性必须自甘卑弱,恪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的意志,受父系文化意识的支配。女人只有安于社会指定的位置,才会受人尊敬。《三国演义》宣传了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其妇女观必然要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作品中的婚姻多属政治交易的手

段,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

在儒家文化的字典中没有爱情的概念,婚姻常常是爱情的代名词,“儒家学说之在众多学派中获胜,以后成为中国社会长期的统治思想和行为规范,绝非偶然。它的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伦理政治学说完全适合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政治的需要,而血缘关系就必须藉男女交合来实现,这就是宗法制度所要求男女关系所遵循的伦理的根本契机。”<sup>[3]</sup>小说中描写的婚姻多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交易,而女性则成为了其中的牺牲品,她们既失去了爱情的选择权,又在婚姻中失去了独立人格,一生永远从属于君权、夫权,这方面,刘备的言论极有代表性,小说写曹操与吕布里应外合,夜袭了徐州,张飞守城失利,令二位嫂嫂也陷于城中,此时,他十分惶恐:

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第 15 回)

将妻子比作“衣服”,这样的比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偏见意识,代表着女人永远失去了“人”的资格,更不用说做人的权利与尊严,这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心理的典型反映。小说中女性存在的价值只是男权的证明与陪衬,至多是男人事业成功的点缀,比如小乔。围绕荆州问题,蜀刘两家的婚姻实质得到了极好的表现。孙夫人敢于违抗王兄之命,与刘备誓死出奔,但也难以挣脱政治婚姻之网的束缚,先被王兄骗回江东守活寡,后又为刘备葬身江底,只争得了一个“烈女”之名。受儒家文化影响,“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男人一生的追求,而女人为男人而存在,就可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争权夺利与一夫多妻制的牺牲品。令人不平的还有,历史上的乱政衰败也往往归之于“女祸”,《史记·外戚世家》中载:“桀之放也,以妹喜;纣之封也,嬖妲己;幽王之擒也,淫于褒姒。”君王自身的失误及封建制度本身的问题,却归咎于柔弱的女性,未免有些强词夺理。三国时代的婚姻被涂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统治者常常利用婚姻关系抗拒他方势力的吞并,巩固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势力,至少也要以此牵制对方。婚姻已与女性的感情要求与真实内心没有关联,在这些婚姻交易的背后是众多女性无尽的眼泪与无言的悲

哀。

其二,女性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自我意识的缺失与话语权势的失语。

《三国演义》中的诸多女性,认同男人的价值观,依附于他们而生活。其自我意识的缺失表现在,她们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自甘卑弱,对社会歧视女性的现象毫无怨言,一生任人摆布。其话语权势的失语表现在,我们听不到她们心底的声音,口里所讲的也多是男人忠孝节义的言语,她们缺少母性的光辉与人性的流露。“大乔”、“小乔”躲在孙策、周瑜的背后,默默衬托着他们的成功;孙夫人、甘糜二夫人以刘备为中心而生活;貂蝉为了完成王允的使命,不惜献身于男人。这方面,貂蝉的经历是很值得分析、关注的,小说写王允见貂蝉深夜长叹,喝曰:“贱人将有私情耶?”她极力否认,并坦然相告:

“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第 8 回)

在她的“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的一再表白下,王允找到了除掉董卓的好办法。历代统治者诅咒女性亡国,尤物难养,却在智穷伎尽之际利用她们。貂蝉用美人计加连环计,使吕布杀掉了董卓,在她的义无反顾中我们除了感到可敬,又为其悲哀。也有人说她是“女荆轲”,她的美貌与肉体是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特殊武器。她其实比“衣服”、“花瓶”的地位更为悲惨,因为即使归了吕布,也不过是做侍妾。曹操兵围下邳,吕布入告貂蝉,她仅有一语:“将军与妾作主,勿轻骑自出。”语含悲痛,吕布死后,貂蝉不知所终。她的故事证明了封建文化为突出男权而牺牲女性极不人道的一面,有谁知道,为赢得封建伦理道德的称颂,女性的牺牲有多么惨重!这是一出失去自我与话语主权的悲剧!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所描绘的“贤妻良母”、“郎才女貌”、“夫贵妻荣”乃至“女扮男装”的故事,都充满了男尊女卑的味道,由此不由使人想起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瓦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

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与话语权势的失语,与中国古代对女性的传统教育有很大关系。东汉班昭的《女诫》、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等都

记录了古代对女性的严格要求,到了明清甚至出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论调,并为她们设立贞节牌坊。《三国演义》女性缺少独立人格的一个证明是,据统计,书中约八十位女子,从姓氏上看,有姓有名者5人,有名无姓者2人,有姓无名者47人,有封号亦有姓者1人,有封号无姓名者3人,无姓亦无名者26人,而且基本不涉及底层劳动妇女。<sup>[4]</sup>姓氏往往是男权意识的符号,“有姓无名”就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小说甚至对女性为求名节自伤自残的行为予以肯定,例如写司马懿兵变成功,杀了曹爽兄弟后:

时有曹爽从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无子,其父欲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诛,其父复将嫁之,女又断去其鼻。其家惶恐,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守此欲谁为哉?”女泣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时,尚欲保终;况今灭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第107回)

以上所写夏侯令女固然有不因曹氏盛衰易心的可贵见识,但故事中亦有反对妇女改嫁之意,并且此种“裙钗节”是以自我摧残的方式获得,所维护的又是男权的尊严,因而不免令人有可悲之感。即使夏侯令女赢得了包括敌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敬,又怎能不让人感慨呢?儒家文化对女性心灵的熏染,已严重造成了她们自我人格的弱化,“截耳自誓”、“断去其鼻”的血淋淋举动,面目全非的怪人式的面孔,无论如何也引不起读者的美感,而小说对此的津津乐道,使我们看到了明显的男权话语的烙印。

### 三、对英雄形象塑造的影响

孔子思想的核心为“仁”,注重上下尊卑的等级意识,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孟子则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小说中均有鲜明的表现,并影响了作品的妇女观。儒家文化注重人的群体意识,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个人属性。所谓的“内圣外王”,是说男人应当看重道德修养与功名心,放弃个人欲求与自我发展,从而使《三国演义》衡量英雄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不近女色。小说妇女观的局限性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其一,主张“英雄必过美人关”,使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失真。

小说认为,真正的英雄不会“好色”,否则就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莫不如此。董卓和吕布中了美人计,才会被人耻笑,曹操是奸雄,亦是好色之徒,是小说中被否定的形象。刘备过不了美人关,因而他只是枭雄,不是英雄。关羽在护送甘、糜二夫人的途中,爱才的曹操对他极尽笼络:

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第25回)

忠肝盖地义薄云天的关羽在美人面前心如古井,成为类型化人物的代表。作者不写这些英雄的七情六欲与家庭生活,也就无法揭示其生动丰富而又真实动人的精神世界,致使人物形象有明显的失真现象。鲁迅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方面,金庸小说中的英雄豪杰刻画得就很成功,克服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弊病。

同关羽一样,常山赵子龙在感情方面也是铁石心肠,桂阳太守赵范与赵云结为兄弟,赵范那有“倾国倾城”之色的寡嫂亦倾慕赵云,这桩英雄美人的喜事却惹得他大怒而去,后来他对孔明说起原因:

“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第52回)

原来一切都出于人伦、名节、君王事业的考虑,惟独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三国英雄就这样以其冰冷的理智扼杀了自己的感情欲求,这样的形象可敬但不可亲,没有了日常家庭生活与情感世界的揭示,使小说显得阳刚之气有余而阴柔之美不足,作者对历史生活的描写显得简单化了,小说缺少了动人心魄与感动生命的一种力量。

从对曹操的刻画来看,他不能过“美人关”,因而不是书中的真英雄。一次酒醉私问左右:“此城中有妓女否?”一副令人作呕的嘴脸。听说张绣的叔叔张济之妻邹氏貌美,命令士兵取来,还向她表白:“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矣。”邹氏拜曰:“实感再生之恩。”曹操不仅好色无比,而且与女人打交道也用权术,为

让邹氏就范,胡言是因为她的缘故才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可谓厚颜无耻。张绣闻知二人私通并在军中取乐,本不是真心降曹的他又开始反叛,而奸雄曹操也为此次的“好色之举”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几乎丧命,还痛失长子曹昂与爱将典韦。

其二,回避英雄豪杰感情世界的描写,使小说人物性格刻画显得单一化与脸谱化。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人本主义的倾向,它不仅和‘神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中世纪不同,而且也同西方近世的人本主义有区别。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因此,有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讲什么‘君义臣忠’、‘父慈子孝’等等。”<sup>[5]</sup>“内圣”的要求,使《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恪守封建伦常,感情世界一片荒芜,小说人物性格单一化的问题由此产生。诸葛亮本是书中光彩照人的角色,风采逼人,在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他的妻子永远躲在他的身后,而且必须“貌丑”,否则贤相就会有“好色”之嫌。勿庸讳言,小说中确有邪恶淫荡令人厌恶的女性,如刘表之妻蔡夫人,她要谋害刘备(第16回);董承侍妾云英与家奴私通,被鞭打后告密曹操,使曹大开杀戒(第23回);还有黄奎之妾李春香,袁绍后妻刘氏等,但若以偏盖全,认为女人只是“衣服”、“工具”,甚至“祸水”,未免有失偏颇。避开女性世界的描写,我们就看不到英雄们立体的多层次性格,形象让人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孔明与关羽成为了“贤相”与“良将”一类人的代表或符

号,不能揭示出他们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物性格也缺少了发展变化,刻画性格方面表现了类型化、脸谱化的现象。如孔明从出场到死都是忠心耿耿,料事如神。当女人成为了男人的影子或衣服时,英雄们人生的舞台就缺少了一半动人的美丽,生命色彩亦随之暗淡。当然,作为最早出现的中国古典小说,恐怕也难以避免这样的缺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明时期的戏曲,其妇女观十分进步。金庸的武侠小说既写出了男人真实的内心,也关注了女性之美,英雄美人相得益彰,令人百看不厌。

总之,《三国演义》既刻画了眼光超群见识不凡的女性,也显示了其妇女观的明显缺陷,这与儒家文化有很大关联,之后的章回小说则有了很大改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就是明证。到了《红楼梦》,其妇女观最为进步,林黛玉追求独立人格,有着独特的人生追求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令人耳目一新。《三国演义》妇女观的局限性,既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与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作家的创作心态有关。关于《三国演义》,可谈的话题很多,笔者所言未免肤浅,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 [参 考 文 献]

- [1] 谭洛非. 论三国文化精神[J]. 古典文学知识, 1994, (6).
- [2] 熊笃. 从《三国演义》看传统“妇道”的变迁[J].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2, (1).
- [3] 何满子. 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 [4] 杨建文. 《三国演义》新论[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
- [5] 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张新潮

## Confucian Culture and Feminist Ideas in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WANG Ju-yan

(Changsh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negative limita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feminist ideas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novel, marriages are mostly presented as means of political deals with women's ideology neglected and emotional demand restrained. At the same time, loss of individuality is accompanied by the lack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discourse power among female characters. This, to some extent, reduces the vividness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male images in the novel. All these owe much to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feudalist society.

**Key words:**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novel; women; Confucian culture